

道统与政统

——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晚生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关键词:道统;政统;政治伦理思想;曾国藩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章编号:1007-4074(2018)03-0033-06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ZDB010)

作者简介:曾晚生,男,高级工程师,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曾晚生.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3):33-38.

曾国藩所处之晚清,政局动荡,朝纲紊靡,官员怠惰,士风日下,政治生态日益恶化。对此,曾国藩深感忧虑:“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1]78}。在居京官任上多年后,曾国藩愈发对官场现状深感不满甚至愤懑有加:“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2]5}。其时,鸦片战争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溃烂,如何挽救“人心唯危”的政治局面,在道光末年有官阶有科第的知识分子,涌现了一批反汉学的程朱学派。表现在政治方面,要求“笃实践履,翰直敢言”,曾国藩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个时期,程朱道学的政论,无非是想利用在宗法社会的思想领域里占有垄断地位的道学正统,来挽救阶级

统治的危亡。如此,在积极寻求匡时救世之方的思想实践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士大夫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将目光聚焦于道统与政统,力图以礼治德政为鹄的、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人才兴政为依托,匡正道统,巩固政统。

一、道统与政统: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

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降,思想家们对于政治统治方式提出了多种构想,形成了以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为代表的诸多流派。至汉代统治者实施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统治历史中处于无可撼动的主流思想地位,并经由唐、宋时期思想家的自觉承袭和理论升华,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思想统绪,即所谓的“道

* 收稿日期:2018-04-10

统”。

“道统”一词由宋代大儒朱熹提出:“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再往前追溯,道统意识是经由唐代韩愈确立起来的。韩愈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异于佛老的“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具体而言就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在韩愈看来,“道”,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反映在政治统治上,就是“礼治”“仁政”“德政”。这也是后世领会“道统”的核心要义。道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礼法,其主要价值在于维护封建礼教和人心治化,为社会运行提供价值共识,即正统意识、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道统本身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但是更需要一代又一代去承接它、激活它、升华它,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治乱的循环和王朝的兴替频繁发作,必然给新上台的统治集团带来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让治下的臣民顺从。除了发挥道统统一思想、构建认同的观念功能外,还必须使用政治强制力来巩固政权、推动变革,这些观念之外的统治方式就构成了一朝一代所谓的“政统”,或称“治统”。康熙皇帝即位不久就曾发出过“治统在朕,道统亦在朕”的宣示。所谓政统,就是通过权力的垄断与集中实现对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与军事到社会与环境的管理。它的特点是强化政治权力与行政官僚,权力等级分明,权威集中突出。依照现代政治和社会理论,道统和政统一起构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统治阶级的权威和被统治阶级的顺从,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民众期待,防止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失范。

考察历史可知,作为封建政治统治的方式,道统和政统在同一朝代中往往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二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但在改朝换代的初期,道统往往表现出超拔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政统则需要依照道统的基本价值框架进行新的构建。所以,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道统是经、是常,政统是权、是暂,政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晚清大儒张之洞就洞悉了其中的道理,认为道统直接表现为不可变的“伦纪—圣道—心术”:“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

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3]160}。固然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如果将二者置于某一朝代,则道统和政统一起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的核心。从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性而言,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主要体现为:政治统治应该本乎天道、合乎礼法、顺乎仕宦、得乎民心。其中,天道、礼法主要属于“道”的价值源泉,而仕宦和民心则属于“治”的主要对象,四者大体上构成了汉唐以来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内涵。

道统与政统,在曾国藩看来既是朝廷巩固统治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大本大源”。他说:“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4]36} 曾国藩初入仕宦居京官期间,一方面,追随唐鉴、倭仁等当朝大儒深研理学,对于儒学道统领悟颇深,并对唐、倭所主张的理学思想推崇备至,立志以弘道为己任。有论者指出,其时曾国藩内心中对待理学的态度,有点像宗教徒对待宗教教义一般,是虔诚信仰的。余英时先生曾说:“唐(鉴)、曾诸人只是奉程、朱的理学为修身的准则,他们并无意在心、性、理、气上另立新说……这正如宗教信仰徒不必人人都发展一套新的神学一样。”^{[5]586} 另一方面,作为汉臣,曾国藩对满清的统治是绝对忠诚的:“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2]111}。他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充满了深重的忧虑,从他居京官后期一系列的奏章可以探知他为维护政统的诚心公意。尤其是其办团练治湘军后的整个仕宦经历,为我们展示了曾氏对道统与政统的拳拳维护之心。也正是在其对道统和政统的信仰和维护过程中,提出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曾国藩的政治伦理思想,概括来看主要是围绕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而展开的以礼治德政为鹄的、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和以人才兴政为依托的政治伦理主张。

二、以礼治德政为鹄的

自孔孟以来,礼治和德政一直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内涵,也是儒生论政施政的重要价值鹄的,以礼治世、为政以德更是构成了儒家道统与政统的主脉。

曾国藩对礼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认为礼是包罗万象贯通世事万端的,故在其为学、从政、治军历程中,对礼的推崇与躬行是一以贯之的,并提出“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政治主张。在他留存的文

字中,关于礼的言论随处可见。在《礼》中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6]410}在《圣哲画像记》中又云:“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乎归?亦曰礼而已矣。”^{[6]250}“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进而,曾国藩对礼的实践内涵进行了扩充:“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7]1576}。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从道统和礼教的角度对太平军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激烈的讨伐:“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6]232}。以此为基调,曾国藩墨经从戎,以礼治军,“征缴”太平军,取得了胜利。为了振兴封建教化、笼络知识分子、肃清太平天国的革命影响,曾国藩在收复安庆不久,即下令恢复县学、府学,并接见安庆所属各道新入学生员700余名。同治三年(1864年),还在安庆设立书局,招徕工匠,刊刻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各种封建典籍。收复天京后,曾国藩即广集工匠2000余人,昼夜不停地赶修江南贡院,并且于当年举行乡试,随后耗费巨资重建江宁府学宫,并亲撰《江宁府学记》碑文,文中攻击太平天国使“三纲九法扫地以尽”,号召要以恢复礼治、振兴封建教化当务之急(见《江南贡院工竣请放考官折》《复陈补行乡试事宜片》)。曾国藩穷毕生之力从事礼学研究,无论是礼经、礼仪的历史考证,还是礼义的理论验证,或者是求仁于己的身心体悟,其最后的指向均是经世治国,即希望使学术最终落实于治术。有论者指出,曾国藩“赋予湘军以礼教文明维护者的神圣使命,奠定了湘军与儒家礼教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一维护礼义人伦的建军宗旨,使得湘军能够更加全面地渗透以儒学为根基的礼治精神。从湘军构成来看,这是一支由‘儒生领山农’的队伍,儒生是礼教文化实践者、维护者、传播者,而山农则是中国宗法礼治社会的基础,儒生与山农结合而建立的湘军,正好是中国礼治社会的浓缩,能够充分地实现曾国藩以礼治军的政治理想”^[8]。

为政以德,是曾国藩恪守终生的原则。曾国藩坚持进德修业,认为官员更应注重修养,为政以德。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

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必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且广也。”^{[9]72-73}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曾国藩时时刻刻以“廉明勤慎”四字自律、自警。他说:“‘廉明勤慎’四字,刻刻持守,以之为将,则称名将,以之居官,则称清官。”^{[1]6}清朝顺治皇帝钦定的《御制人臣敬心录》有这样一段话:“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计太平之理,不可得矣。”^{[10]226}曾国藩深得其义,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是由为官者身正与否决定的。为政者一身正气,整个社会氛围就会充满正气,从而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侵蚀。所以,为政者,既要坚持个人操守,又要重视社会正气的渲染。在官员德才之辨的问题上曾国藩还特别强调官员德行的根本性与重要性,并作了非常形象的比喻:“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1]492}。为此,曾国藩总结提炼出“勤恕廉明”的官德条目:“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无往行不通。”^{[1]3}在这四条官德中,曾国藩结合自身体会,尤其强调勤政的重要性的本源性的。在《致曾国荃书》中,曾国藩认为要为民谋取福利,必须要以一个勤字当头,同时也要用自己的真实情感去为民众办实事、好事。他写道:“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为万民,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1]5}在统帅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对于勤政,总结提炼出更加具体的“五勤”之说:“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相互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神鬼亦通”^{[6]439}。曾国藩倡导的“五勤”之说,得自于自身的修身、治家、为政经验,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平实易行,对于政德的塑造具有基础性价值。

三、以经世致用为宗旨

面对当时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与西学东渐的社会变迁趋势,晚清统治集团在应对时局问题上产生了分裂,保守一派主张沿用祖宗古制,革新一派则主张因时变势革故鼎新。曾国藩深受唐鉴、倭仁等革新派的影响,逐渐确立了经世致用的信念,并将经世致用奉为匡时济世的宗旨,大力倡行之。

自乾嘉以降,汉学兴起,宋学式微。当曾国藩入仕之时,汉、宋之争在儒生士子中日趋激烈,各执一端,要么陷入故纸,要么流于空谈,于事无补,于国无益。居京官时期,曾国藩对之甚为反感,笃志自拔于流俗,主张会通汉宋之学,以实学相砥砺。成长于湖南的曾国藩,深受湖湘文化的熏染,而经世致用正是湖湘文化与生俱来的独特基因。湖湘学派诞生于南宋内忧外患多事之秋,传承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家破国亡的屈辱感和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因而湖湘文化精神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为了振兴民族要“经邦济世”,为传承文化精神更要经世致用。宋代的湖湘学派强调“求仁履实”,突出对个人的道德品行提出要求,强调其素质的磨砺和塑造。湖湘学派第二代大师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强调作为人才首先要遵守伦理规则,要“有体”,其次具备“治事”能力和才干,要学有所得、学以致用。湖湘学派第三代大师张栻主张“知行并发”,在强调知行合一的同时,更加注重“传道济民”的实践指向。自张栻主掌岳麓书院之后,书院教育的目的由单一的科举应试拓展为“传道济民”、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自此,这种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学风在湖湘地区世代相传、广为传习。钱穆先生对湖湘学风与清朝汉学之间的关系曾作过精当的评价:“清儒考证之学,盛起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间被其风最稀”^{[12]638}。其时,魏源、欧阳厚钧、贺长龄、唐鉴等湖湘籍学者,在讲求程朱理学的同时主张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注重经世济用之学。魏源尖锐批评汉、宋之学繁琐空疏、脱离实际无补于民生。他说二者“民漠之不可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13]36},强调出经入史,学以致用。唐鉴一生,在坚持修身“守道”的同时,更注重“救时”“济世”。他强调:“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14]16} 曾国藩超越其师,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之学”实质是经

世之学。他将儒学“三门”发展为“孔门四科”:“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5]4}。此经济之学并不是现代的经济学学科,而是经世之学、经邦济世之学,是与道德心性之学对立的主张实用的治国安邦之学,与现代政治学学科相仿。

曾国藩作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同治中兴”的中流砥柱,伴随着职务的迁升以及理学造诣的提高,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弘扬经世致用的求真务实精神,整风肃纪,倡导西学,既针砭时弊,又改革创新,为晚清仕族带来了新风,打开了思路,冲破了藩篱。面对残败不堪、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曾国藩深知在意识形态宣传上下再大的功夫都无法走出困境,只有讲求务实、实干求真才能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国藩担任京官的数十年间,就时局问题先后作《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奏疏,对各种时局问题进行鞭辟入里地分析,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性,集中反映了儒家“荷道以躬、舆之以言”宗旨。曾国藩还特别宣扬顾炎武“明道救世”的思想。他指出:“读书在通经术、谙世务。经术通,则义理入而内心有主,世务谙,则闻见博而应事不穷。”^{[7]5 910} 为此,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一节中,高度评价曾国藩经世致用的救国之志:“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之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16]134}。梁氏如此之评价,足见曾国藩倡行经世致用宗旨的巨大历史影响。萧一山则更进一步分析了曾国藩经世致用的救国之道:“他的救国方案,是分作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来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说,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革新守旧同时进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17]179-180} 曾国藩所倡行的经世致用

宗旨,并非违背道统、冲击政统,而是以务实的方式将道统与政统放在时局中考量,将弘道与救国统一于政治现实需要。正如龚自珍所言:“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四、以人才兴政为依托

人能弘道,为政在人。历史给出一个基本逻辑:道统与政统的维系,关键在于人才的振兴。曾国藩对此发表了诸多言论:“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求阙斋日记类钞》);“今日所讲求,惟在用人一端”(《应诏陈言疏》)。然而,面对艰危之时局,曾国藩痛感人才之匮乏。他在奏稿中说,“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18]7}对此,曾国藩发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的呼吁,主张大力推行人才政治,以扭转时局。

人兴而政举,用人须用正人。曾国藩认为,“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复毛寄云书》)“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19]168}“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借以报国者也。”^{[20]37}可见,曾国藩对“正人”的强调是特别突出的,这也是其鉴别人才的前提。“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2]以此为指引,曾国藩在识人衡才方面摸索出一套独到的方法,并付诸实践。

首先,人才难得,需诚求礼尊。曾国藩曾发出感叹:“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得一人,则一己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1]192}对于隐没于市井的人才,若“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是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11]469}。基于这种独到的认识,曾国藩提出,“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2]20}。在办理团练伊始,曾国藩就发布了《招某绅耆书》,力求多方延揽人才:“孳孳勤求,冀得乡邦贤士不我遐弃,肯辱惠临,借以博采周咨,用匡不逮。故或奉书促驾,或倒屣迎宾,延揽英豪,咨諏善道,耿耿此心,想蒙谅

也”^{[11]232}。足见其求才之恳切,可谓溢于言表。曾国藩“待部下,一秉至诚,将士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故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用,而国藩见有善则无不极口称誉”^{[21]5}。

其次,人才需广收慎用。曾国藩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他尤为注重对人才的广收慎用。在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斗争的过程中,曾国藩广罗天下豪杰志士,逐渐形成了他独有的“智囊”——素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的曾氏幕府。从这个阵营里相继走出了一大批栋梁之才,文有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弟子”,政有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等名“中兴名臣”,武有罗泽南、曾国荃、江忠源等“卫国名将”,此外还不乏外交、科技方面的佼佼者,可谓“天下俊彦之士均集结于此”。曾国藩曾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尽无可着力之处。”^{[22]22}曾国藩将麾下的人才分成了四类,并用其所长:第一类如李鸿章、李元度、郭嵩焘等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第二类如左宗棠、彭玉麟、李瀚章等“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第三类如吴敏树、赵烈文、徐寿等不则以公事,“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第四类如冯焕光、洪汝奎等“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因事任人,量才而用,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优长。对于曾国藩“广收”和“慎用”的人才思想,曾国藩学生薛福成的一句话可以视为最好的注脚:“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23]。据统计,仅被曾国藩推荐或亲手提拔的都抚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李续宜、杨昌浚、蒋益澧、刘蓉、刘岳昭、彭玉麟、唐训方、郭嵩焘、江忠义、刘坤一、刘典、曾国荃、李兴锐、李宗羲、李瀚章、李鸿章、吴坤修、沈葆楨等三十余人,其他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司道府县之类,数以千计^[24]。为此,《清史稿》如此评价曾国藩:“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二》)曾国藩人才兴政的主张及实践,突出显示其人才政治的巨大效应,不但明显地改善了官僚集团的风气,而且客观上暂时巩固了清廷的统治,为道统的承继和政统的延续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由人才政治成就的。

五、结语

曾国藩的政治伦理思想,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以道统与政统为核心,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曾国藩对道统与政统的信仰和维护,一方面成就了他的学问与事功,另一方面也延缓了清廷的崩溃。同时,曾国藩毕其一生,弘扬和革新了道统,暂时巩固了当世的政统。但是,曾国藩的政治伦理思想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局限性与文化保守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予以批判地继承。

引用文献:

- [1] 马平,龙梦荪.曾文正公学案[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2] 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M].北京:中国书店,2017.
- [3] 张之洞,何启,胡礼垣.劝学篇·劝学篇书后[M].冯天瑜,肖川,评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 [4]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7]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88.
- [8] 朱汉民,吴国荣.以学术为治术——曾国藩的礼治思想及其经世实践[J].中国文化研究,2007(1).
- [9] 曾国藩.曾文正公日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
- [10] 乔立君.官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 [1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杂著[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1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3] 魏源.魏源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4] 唐鉴.学案小识序·唐确慎集:卷一[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15]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M].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 [16] 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7] 萧一山.曾国藩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18]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1册[M].北京:线装书局,2014.
- [19]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第22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
- [20]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
- [21]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22]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第9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
- [23]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M].光绪十四年刻本.
- [24] 蒋广学.曾国藩: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J].江苏社会科学,2005(5).

(责任编辑:陈 伟)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Political Orthodoxy: A Probe into ZENG Guofan's Political and Ethical Thoughts

ZENG Wanshe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extant texts and discourses of ZENG Guofan contain rich political and ethical thoughts. Tracing the source, what Zeng Guofan had been persistently committed to, sincerely believed in, respectfully fulfilled and strongly defended during hi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areer were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political orthodoxy of the Qing Court. Focusing on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political orthodoxy, Zeng vigorously advocated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propositions of rule by rites and ethic,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and of strengthening politics with talents, trying to seek a certain anchoring force or path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political orthodoxy through his own understanding and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Confucian orthodoxy; political orthodoxy; ZENG Guofan; political and ethical thoughts